

高著「中國知識分子與辛亥革命」

張 朋 園

原 書：Chinese Intellectual and the Revolution
of 1911. 249pp. Glossary, Abbreviations,
Bibliography, Index.

著 者：Michael Gasster

出版者：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, Seattle, 1969.

定 價：美金9.50元

清末的兩大救國運動——革命與立憲——近年頗引起歷史學者的注意。他們的研究心得，年有著作發表，無論中文、西文，都有相當份量。他們探討的範圍無論大小，力求深入，有引人入勝的論斷，發人深思的解釋。這裏介紹高慕軻（Michael Gasster）博士的「中國知識分子與辛亥革命」，便是一本值得玩味的新著。

這本書研究的時限，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間；一九〇三至一九〇五及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，亦略有涉及。書中的主角是革命黨的領袖，配角是立憲派的首腦。全書所探討的問題有二：革命之推展及未來之理想政治組織。由於革命是在改革失望之後引發的，所以先敘改革運動的來龍去脈。全書分六章，以第一、二章成上編，論改革之興起與失敗；以第三、四章成中編，論同盟會成立後之革命思想；以第五、六章成下編，論無政府主義對知識分子的影響。

全書雖有如此的篇章，但討論則運用激進主義、知識分子、革命、現代化等觀念來涵蓋。知識分子是人的問題，激進主義是思想的問題，顯示著者是以這一時期知識分子的思想為討論的範圍。根據著者的觀念，革命、民族主義、民權主義、社會主義等都是激進主義。按照著者所下的定義，激進主義要求徹底的改變，極端的改變，絕不妥協；是暴烈的行為，是感情的衝動。（頁 XXVIII）如此，我們不得

不承認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在中國屬於激進的思想，無政府主義原為烏托邦的想法，更勿庸置疑了。

知識分子，是那些「悲天憫人」，而以天下興亡為其責任者的代名詞。（頁 XXVI-XXIX）著者所舉的代表人物有孫中山、胡漢民、汪精衛、朱執信、章炳麟、劉師培、張靜江、李石曾、褚民誼、康有為、梁啟超等。其中除了康、梁之外，都是激進主義者。康梁之所以也在本書中佔有相當篇幅，因為他們是激進主義者的對手，尤其是梁啟超，他以立憲的觀念向激進主義者挑戰，自不能不論及。

無論立憲或革命，中國知識分子所要求的，不外乎使他們的國家現代化。所以著者在討論激烈的革命之同時，常常加上現代化的觀念，問其是否可以使中國現代化，激進與漸進比較之下，何者對現代化有效？

著者何以選擇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為時限？何以涉及的人物只有孫中山等十餘人？原因是辛亥之前，革命黨領袖羣所流露的思想，大多刊布於東京的民報（同盟會機關報）、天義報和巴黎的新世紀（留歐學生創辦）。這三種刊物是研究此一時期有關民族、民權、社會主義等思想最具體的素材。

任何一本書都試圖解答某些問題。如果能達成此一目的，必定有突出的論點。高博士的這本著作自不例外。他在結論中回答了目下最流行的幾個問題：辛亥革命是不是一個革命？他說這是革命，因為共和建立了。（頁 229）再問，同盟會對辛亥革命的貢獻是甚麼？他說同盟會有建立共和的理想；共和建立了，這就是同盟會的貢獻。（頁 230）再問，共和的生根問題？他說，知識分子有實現民主（代議制度）的理想，雖然民國的共和制度不甚成功，但決不能肯定共和在中國不能生根。（頁 233）這些觀點應是一般學者的共同了解，讀者讀畢全書，會有「深得我心」的感覺。

著者的成就自然不止於此。本書的特點在對若干較小的問題有深入的分析。譬如論同盟會，著者認為此一組織雖然在反滿的大前提下結合了知識分子，但是這並不是一個健全的組織。他說同盟會之所以不健全，乃由於觀念上的出入。觀念之不同，或由於年齡的關係，或由於出身背景的關係。以章炳麟為例，章氏雖然有無政府主義的激進思想，實際上是一個保守主義者，這是因為他的年齡較大，而又深受

傳統文化影響的關係。(頁51-59, 203-204) 這種推論應該是站得住的。

此一時期知識分子之崇尚激進主義，究竟他們對於當時所流行的政治理論了解到了什麼地步？著者說，革命黨人知道他們反對些什麼，但革命之後要建設些什麼，心目中並沒有一個明確的藍圖。他們雖然大談民主與共和，實際上他們並不十分了然民主與共和的分野。(頁 106-108) 著者指出，民報和新民叢報的論戰，雙方的執筆人傾其政治學之知識，引用利於自己主張的理論，希望一舉駁倒對手。但是他們的政治學的知識甚屬有限。梁啓超主張君主立憲，引用波倫哈克(Conrad Bornhak)，濟惕爾(Max von Seydel)等人的政治理論來支持自己的論點。革命黨汪精衛、胡漢民等，爲了駁斥梁氏的說法，引用了耶陵尼(George Jellinek)、拉攀(Paul Laband)等政治學者的理論。著者指出，無論是梁啓超或革命黨所舉的政治學家，大都是與他們同時的德國人。這批德國政治學者的目標，在改善本國的行政制度，很難說他們是贊同或反對共和。耶陵尼和拉攀都是不折不扣的君主立憲論者，他們的思想與濟惕爾並無太大的差別。(頁 121) 革命黨人難免牽強附會，但梁啓超也不能察覺其對手的毛病。可見雙方的政治知識經過日本文轉手得來，並不高明。

革命黨與梁啓超論戰的結果，猶如李劍農所說，錦標應該屬於革命黨。但梁啓超的言論並非沒有價值。著者引蔣夢麟在西湖中的話：「我們從梁啓超獲得精神糧食。孫中山……則使我們的革命情緒不斷增漲」，略爲修正了李劍農的看法。他進一步指出，梁啓超對中國的前途是樂觀的，至少是達觀的，但是他自己却是一個悲劇型的角色。雖然中國的知識分子無不承認梁啓超開啓了他們的智慧，給了他們若干新觀念。但梁氏受人尊敬，而不被追隨；他能牽動人的想像力，而沒有絕對令人服從的吸引力。著者指出，其所以如此，因爲梁氏的手段過於溫和，解決不了中國人所面臨的難題。中國需要變的太多，不容許「慢慢來」的想法。所以在革命運動的發展中，情緒掩蓋了理智，以爲革命可以在一夜之間將中國全部改造。(頁243-244)

維新與革命各有長短，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也各有好壞。所以推翻滿清是一回事，建設什麼樣的政體又是另一回事。革命黨人的排滿意識，除了「非我族類」一個觀念外，沒有進一步去考慮其他的問題。能打倒滿清建立民國，固然很好，萬一

不幸遭到挫折呢？民國以後的混亂，梁啓超有先見之明，革命黨却顧不了許多，中國終於不免一次、二次、……的革命，這是很不幸的。（頁244-245）

激進的革命在中國迅速的發展，但不禁又要問，革命與現代化的關係如何？著者的回答是：激進的革命是不容易達成現代化的。（著者對現代化與民主兩個觀念分開討論，這裏將之合併。根據一九六六年出版之 S. N. Eisenstadt, *Modernization; Protest and Change* 一書，現代化應包括政治、社會、文化三方面的變遷，政治的變遷，係走向參政制度的擴大，即民主制度的確實建立；社會的變遷，包括社會結構與經濟制度的合理化；文化方面則為傳統價值的逐漸改變。）在那樣觀念分歧的革命運動中，加上立憲派之支持清廷，革命顯然不容易成功，現代化也就難於期望了。現代化非有長時間的努力不可。知識分子的急躁，理想之過高，自然會發現革命一無成效。他們忽略了中國有着極為特殊的社會傳統，現代化之移植格外困難，其進程格外緩慢。（頁245-246）

以上所舉各點，可以看出高博士對革命思想研究的功力一般。

當然每一本書有其長處，也不免有所短處。著者對民報的深入分析，使我們進一步了解這一個時期激進知識分子的所思所志。但是由於全書以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為其時限，在此範圍之外的知識分子，雖然多少也提到了一些，却難於滿足讀者對革命領袖羣思想全面了解的期望。從某種角度來看著者對這一本書範圍的限制，似乎有欠合理。以激進觀念而言，中國人的激進思想，似非始於一九〇五。辛亥革命何時起止，固然見仁見智，一九〇五年似乎太晚了一點。著者把梁啓超看作改革家而不是革命家。若以一九〇五以後言之，這是不辯之論。但在一九〇三以前，梁氏也嘗提倡激進主義。梁氏自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三年間的破壞論，不僅主張政治上要破壞，同時文化上也要破壞。所謂破壞，不過是革命一詞之一而二，二而一的意思。無論著者一再說明他斷限的理由，但從本書的平衡與知識分子思想承先啓後之連續性看，似乎有進一步敘述的必要。著者在上編所論梁氏之激進思想，似有過於簡略之感。再者，著者在追述章炳麟的無政府主義時，指出章氏為一保守的、傳統的激進主義者。這是引人入勝的論點。但基於保守與傳統兩個觀念，似乎不能忽略了康有為。康的大同書有烏托邦的想法。他認為大同世界是無國家、無家族、不

重夫妻關係、火葬場比鄰爲肥料工廠的社會。這種思想實無異於無政府主義。如此，康在激進主義方面也該有一席之地。以上是就一九〇五以前激進思想舉例而言。

至於一九〇七以後，革命的大勢固然已經形成，而革命黨人的激進思想依舊長驅直進。革命前夕的民呼、民吁、民立等報在上海發行，其加速暴風雨的來臨，當無疑義。如果著者再有相當的篇幅，將會使本書更爲精彩。

著者謂現代化是長時間的進步現象。然而革命黨過於急切，要在一夜之間將現代化移植中國，不果，因之感到失望，只有掀起一次、二次、……的革命。梁啓超的思想溫和，他的著作能吸引人於一時，却不能令人長久服膺。這顯示革命和改革有着很大的不同。假如運用著者所引到的 Samuel Huntington 的理論來看這一個問題，著者似乎還可以進一步發揮。Huntington 說，改革（reform）比革命困難。革命是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，破壞原有的一切，使社會結構、政治制度、文化價值等一齊改變。改革的目的雖然也着眼在這三方面，但手段非如革命之激烈。改革家往往不能同時推行兩個改革方案，即使是單一的計劃，有歡迎者，也會有反對者，如何運用，全憑改革家的心有靈犀一點通。（見 S. Huntington, *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*, P. 344-349）又如 Crane Briton 所說，革命過去之後，掌握政權者面臨層出無窮的難題，他要改革舊的制度，要建設新的制度。現實使他不能再採取激烈的手段，如果他過去是激烈的，必然轉趨溫和；如果他本來溫和，顯得更爲穩健。（見 C. Briton, *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*, P. 122）這顯示由激烈的革命到溫和的改革有其必然性。二十幾歲的人希望用激烈的手段，三十幾歲以後負起了責任，現實逼使他不得不轉趨溫和，革命黨人的革命三時期（軍政、訓政、憲政）爲烏托邦的夢想。但當他們執政以後，不得不轉趨溫和，也正是這個道理。這是由激進轉趨溫和的關係，順便略爲補充，不知著者同意否？

大體言之，高博士的這本著作是成功的。其客觀而有社會科學支持的論證，幫助我們認識了近代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個問題。